

【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DOI:10.15986/j.1008-7192.2020.04.001

# 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价值意蕴、挑战与进路选择

张永霞<sup>1</sup>,刘宏伟<sup>2</sup>

(1. 武汉理工大学 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 河南城建学院 法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36)

**摘要:**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应对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的需要,是引导全球化语境中多样化思潮的需要,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虽然具有重大的价值意蕴,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在新时代面临新情况、新挑战,要寻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路径:一是要突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二是要借助大数据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方式,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三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意蕴;进路选择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0)04-0001-06

作为一个解释世界,尤其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价值观体系,意识形态有其独特的社会实践功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sup>[1]</sup>。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所以我们在新时代要直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的现实,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一、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意蕴

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应对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的需要

在新时代大变局中,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形势、新变化、新趋向,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依据。今天,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固然重要,但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文化软实力对

于国家治理来说并非可有可无、无关痛痒的“精神催眠曲”,而是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柱”。“软实力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的影响力,是一种国家价值的认同力,也是一种道德感召力”<sup>[2]291</sup>。被誉为“软实力之父”的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约瑟夫·奈认为“软性的同化权力与硬性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如果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将更愿意追随其后。”<sup>[3]234</sup>因此,国际竞争重点的转移决定着各个国家要重视文化软实力。而意识形态又是文化的灵魂和内核,意识形态建设是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意识形态软实力较量输人一筹,必将在整个综合国力的大比拼中处境被动、受制于人。

### 2. 引导全球化语境中多样化思潮的需要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面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挑战;教育的传统引导方式面临新媒体的挑战等等。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汹涌澎湃、不可阻挡。多样化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它们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德国前总理、战略思想家施密

收稿日期:2019-12-05

作者简介:张永霞(1990-),女,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刘宏伟(1990-),男,河南城建学院法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E-mail:xinsha425@163.com

特指出,当代世界的道德沦丧、价值颠覆、理想幻灭、礼崩乐坏,说道:“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人心中已经失去了道德约束。对个人成就的满足感将愧疚之心驱赶得无影无踪。”<sup>[4]86</sup>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处于暂时优势,深化改革下各种深层矛盾问题交错丛生,西方和平演变战略越演越烈,与此同时,网络化信息化狂飙猛进,席卷全球。可以看出,多样化社会思潮产生的背景复杂多样。因此,在多元化社会思潮背景下,如何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新时代的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 3. 巩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需要

任何政治统治都离不开物质和精神两种力量的支撑。同样道理,政党维护执政合法性,需要“软硬兼施”,特别需要作为软实力的意识形态的支撑。英国学者帕金认为:“政权不仅仅靠强制而存在,而来自下层的某种程度的道德支持,对于任何权力制度的长期存在都是必要的。”<sup>[5]75</sup>在现代社会,执政者一般不是凭借军事暴力,也不是凭借传统权威和个人魅力权威,而是凭借文化和意识形态方式获得执政合法性资源。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异常复杂激烈,同时,主流意识形态在具有竞争性的意识形态中,还远未获得应有的竞争优势,因此我党的执政合法性遭遇到巨大的挑战和困难。由此可见,在社会转型,特别是利益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中,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维护或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方式显得越来越重要。德国学者海克·霍尔比格认为:“当代中国之所以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不仅是因为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明确的挑战,而且还因为这种合法性的来源已经从经济增长转向意识形态。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领导集体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同时党面临着如何保持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连续性的难题。”<sup>[6]84</sup>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顶层设计、稳步推进,力求凝聚共识,提振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士气,开创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进一步重申并准确定位了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工作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明确提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sup>[1]</sup>。新时代我党特别突出思想领导权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因为它是维护或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 二、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

### 1. 现代化挑战:“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泛起

意识形态在今天遭遇太多误解,有人视“意识形态”为洪水猛兽,严重干扰个人生活,唯恐避之不及;也有人视“意识形态”为“政治挂帅”时代的产物,认为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识形态俨然已经过时,需要摒弃。回望历史,此类观点并不陌生。早在1955年法国政治理论家雷蒙·阿隆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时,他就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一词。在颇有影响的著作《政治人》中,美国的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也使用了题为《意识形态的终结》的章节作为该书的结尾,他认为既然工业革命的问题已经解决,虽然民主的阶级斗争会继续,但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文化学家丹尼尔·贝尔的拥护,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宣称“旧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真理性,丧失了它们的说服力”“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sup>[7]462</sup>。英国的麦克里兰也认为意识形态作为启蒙理性的产物,已经被悄然消解了。80年代,在苏东剧变的背景下,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开始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改革开放之后,受西方非意识形态思潮的影响,国内有些学者主张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倡导共建人类美好家园,主张国家制度、民族生活要非意识形态化。所谓非意识形态化,就是指以淡化意识形态和价值中立为核心价值,主张在处理社会问题过程中,单纯面对问题本身而回避意识形态取向的社会思潮<sup>[8]</sup>。其实质是削弱甚至取消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非意识形态化在中国的当代表现就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去意识形态论、超越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告别革命、远离崇高”的后现代主义等。综观各

种不同的非意识形态思潮,其出发点、目的都是一样的,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继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从而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通过和平演变,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刻意回避意识形态性很强的问题,以“价值中立”的名义,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在实践中是非常有害的。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们面临着“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严峻挑战。

## 2. 信息化挑战:网络意识形态呈现乱象

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于2018年1月31日在北京发布。报告称,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7.72亿,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9.1个百分点。互联网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它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手段。在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和工作的“主持人”,每个人都有接收信息和发布信息的权利。人们不再仅仅单向地接收党和政府信息的发布和意识形态的灌输,网民还可以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我们宣传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载体、手段、内容等;但另一方面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稳,就会削弱党和政府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和领导权威。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在引领社会思潮时就会面临网络思想中的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挑战。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前,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从工具的意义上讲实际上牢牢地掌握在党政宣传部门、传统媒体机构和高层理论学者那里;但是在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很容易受到网络传媒资本、微博大V意见领袖和网络自媒体终端等的影响。党和政府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完全操控者,由于网络资本和技术力量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在大数据时代,有可能变得“迷茫”甚至“失语”。并且随着大量信息的爆炸式递增和传播,导致网络信息的多元化,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观”、第三条道路等社会思潮通过微博、微信、QQ、新闻网站等充斥着网络空间,从而削弱了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优势。马克思主义不断遭到误读、曲解,在互联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逐渐边

缘化,呈现去中心化的危险。

## 3. 主体性自身的挑战:腐败之风影响价值认同

腐败是传统社会的顽疾,是现代社会的“肿瘤”。历代帝王为了治理腐败,可谓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很多办法甚至非常“现代”。比如北魏太武帝建立“举报制度”、文成帝的“长期追责制”、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的“财产公开制度”等等。腐败像顽疾一样,在古代社会不能取得治本之效。在现代社会如果不去治理腐败,它就会像“肿瘤”一样越长越大,最后成为致命威胁。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面临挑战,在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丧失抵御渗透、明辨是非的政治敏锐性。与此同时,西方的某些错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大地动摇了一部分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使他们失去了对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坚守的能力,人生迷茫、价值错位,“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由此滋生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消极腐败之风成了影响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态和政治生态良性发展的“拦路虎”。

腐败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使其给人虚伪的印象,对意识形态具有重大的致命影响。因此,要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以实际成果赢得人民的信任。关于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之间的关联研究,已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热点。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意识形态缺位与腐败是互相影响的。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急剧衰落的同时,社会意识形态‘百花齐放’、多元化。由此带来的负面后果空前严重,如政府权威和权力急剧衰落,政府和社会沟通不通畅,官方腐败日益严重,缺失官方意识形态,不同信仰社会群体易发冲突,全社会生活的‘无意义感’。”<sup>[9]49-53</sup>毫无疑问,长期以来较为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的紧张度持续发酵,严重削弱了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和信念。而这些,又直接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应有的信任度、吸引力和凝聚力大大降低,它削弱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 三、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选择

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定话语系统,影响整个社会话语体系,而意识形态的变更,必然伴随着相应话语体系的变化。在社会基本建设时期,主导阶级或政党要把本阶级、本集团的基本观点、原则、理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给社会大众,使其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仅依靠统治权来支持,它的运转与维持更要依赖于民众的积极认同。因此,要从“接受”角度来思考在新时代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 1. 突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真理性决定着某种意识形态能否得以继续存在,也决定着民众对该意识形态的认可和接受程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sup>[10][11]</sup>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彻底的理论,因为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它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起,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人民谋幸福。这就彰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马克思曾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和“高卢雄鸡”来比喻哲学理论的功能。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像“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更像高卢雄鸡在黎明时报晓,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sup>[11]16</sup>,这就为我们未来的努力指明了方向,从而彰显了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价值追求,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同时又善于充分利用新媒体,讲述中国故事,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载体。与其他形式相比,媒介具有透过视觉和听觉营造出的鼓动性和影响力,从而也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国际和国内展示形象的主要手段,进而实现内容与形式无缝衔接。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掌控媒介话语,也才能展现时代魅力。所以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真理内容与新颖形式的统一,从而突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增强其说服力。

#### 2. 借助大数据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形式,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在大数据时代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途径。借助大数据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借助大数据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创新。生活中用淘宝、京东等电商购物的用户都知道,这些电商基于你的浏览喜好,一种基于大数据算法的精确广告方法,可以精确推广产品并且能降低成本。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也可以根据用户的浏览信息,依据大数据推算出用户的喜好,甚至可以预测出网民的思想动态,以及时推送出网民喜欢看和喜欢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栏目,从而为网民理论学习提供技术支持。其次,利用互联网技术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表达方式。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是APP的时代,网民的手机或者电脑上最常见的就是APP,现在开发的APP主要有社交APP、购物APP、视频APP、音乐APP、拍照APP、健身APP、工作APP等,所以,要借助这些APP平台去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比如在微信这个社交平台上,要利用好微信公众号、腾讯新闻这两大信息推送渠道,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方式。求是网的微信公众号在这方面走在前列,它用视频、漫画、短评、有声书、小故事等亲民、接地气、受欢迎的方式及时地传递中央的声音、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后,借助大数据的优势,培养出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网络意见领袖。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在网络媒体资本横行的时代,“水军”一词经常出现在互联网上。网络水军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是被网络公关公司聘用的网络人员,他们以注水发帖来获取报酬。虽然我国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网络水军进行管理、约束和惩治,但是这种现象还不能销声匿迹,仍然活跃在网络上。“水军”只是网络资本运营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网络资

本如果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那么产生的后果我们不敢设想。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这部分人我们不去团结,人家就会去拉拢。要把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引导其政治观点,增进其政治认同。”<sup>[12]325</sup>因此,我们必须培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网络意见领袖。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及时地分析网民点赞和热门事件的排行榜,马克思主义网络意见领袖通过自媒体、公众号、党的新闻网站等及时引导舆论导向,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舆论的发展,为广大互联网用户打造一个晴朗的互联网世界。

### 3.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人类的大脑结构是网络状的,其各种断面是类似蛛网式的结构,均有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来看,它是知与情的“合金”,因而具有比一般观念更为强大的能量。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们评判事情的价值依据。人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审视和评议一切现实事物和心中的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部的同一性的特点,在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中不会有自相矛盾的冲突。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评价尺度,是人们评判事物的理论依据。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观念到行为的过滤器。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们由观念到行为中的指导作用,是培养人的重要目的。“观念支配人的行为”,要培育人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行为的准则,自觉地筛选和过滤脑海中的认识和想法,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念支配人们的行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们由观念到行为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决定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能够吸引和凝聚其它观念,使之增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和目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和保障。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纽带、精神支柱和深层次道德支撑。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引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灵魂和指南。倡导、宣传、引领全国各族人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需要常抓不懈并做扎实的工作。一种价值观要得到践行,必须进行广泛地宣传教育,提高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并在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促进实现从价值认同到自觉实践的跃升。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等形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01).
- [2] 胡鞍钢,门洪华.知己知彼:加强中国软实力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3] 约瑟夫·S·奈.硬实力与软实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4] 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柴方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5] 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M].刘东,谢维和,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
- [6] 海克·霍尔比格.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重构:决定因素、进展和局限[J].吕增奎,译.国外理论动态,2009(12):45-49.
- [7]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M].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 [8] 李辽宁.国内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产生的原因、本质及其应对策略[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2(5):13-16.
- [9] 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与文明复兴[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下转第12页)

## On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Coping Strategies to Exert the Guiding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stage when China has won a basic victory in the anti-epidemic of COVID-19

TAO Xin-jie, LU Bing-hui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guiding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g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implement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 strategic deployment on both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dvanc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hold firmly the leadership of ideology. In the new stage the main issue of the whole country has gone from fighting the epidemic to resuming work and production so as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n this case, problems inspecific content, consciousness 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challenging its guiding function. Therefore it is critical to work out the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ot, soul and fla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new sta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uiding function; dilemma; realistic strategy

【编辑 吴晓利】

=====

(上接第5页)

##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Value Implication, Challenge and Path Choice

ZHANG Yong-xia<sup>1</sup>, LIU Hong-wei<sup>2</sup>

(1. School of Law,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2. School of Law, Henan University of Urban Construction, Pingdingshan 467036, China)

**Abstract:**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handling the soft power competition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leading the diversified ideological trend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consolidating the ruling legitimac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has great value implication, though the struggle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is still complicated. 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and challenge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seek the new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highlight the truth of socialist ideology so as to improve its stringency, innovate the way of getting publicity of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the help of big data to enhance its attraction, and als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in socialist core value to increase its cohesion.

**Key words:** the new era; socialist ideology; value implication; path choice

【编辑 吴晓利】